

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与 “新经济思想史”研究^①

贾根良 姚开建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陈旧的宇宙观和数学形式主义的“自闭症”思维,使其无法适应社会科学诸领域中广泛涌动的演化科学新范式的发展潮流。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不仅来自演化社会科学大趋势的要求,更主要的是起源于中国问题意识。经济思想史研究可以为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作出如下贡献:培养经济学多元主义思维,瓦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统治地位;为经济学中演化科学新范式的发展提供必备的建筑材料,为其理论创新的成败提供历史上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为其目前发展中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或被忽视的重要理论问题提供新思路 and 灵感来源;为解决中国问题并提出重大与原创性的理论命题提供支援意识。为达到这种目的,提出“新经济思想史”的如下构想:从哲学基础角度入手,按照经济学研究的两大传统重新构造西方经济思想史的体系结构并梳理其演进过程;重点梳理经济演化思想史并对其作出新的阐述;增加以现实观察和历史经验为基础的经济理论并以“经济政策思想史”作为其重要研究内容。

关键词: 经济思想史; 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 “新经济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 F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08) 12-0057-08

作为与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等处于平等地位的经济思想史学科,一直被严重忽视,人才流失异常严重,该学科在全国普遍面临着后继乏人的状态,一些高校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和教学几乎陷入停顿状态。如何振兴经济思想史研究,这是我国经济学发展中不容再忽视和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为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振兴和重大创新提供了历史机遇。

一、中国经济学为什么要自主创新

2000年法国学生发起了一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②英文原名为 post-autistic economics movement。在英文中,“autistic”是精神病学上的一个术语,具有“自闭症的”、“幻想的”或“虚构的”的含义,法国学生使用这个术语指责西方主流经济学是“自闭症的经济学”,对西方国家经济学教育和科研中所存在的严重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有研究者指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兴起标志着西方经济学遭遇到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但是,与西方学生这种造反运动相反,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经济学界却兴起了一股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盲目崇拜的潮流。如果阅读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相关文献,我们就不难发现,这种教条主义不过是西方经济学中主流经济学教条主义在中国的翻版。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这种教条主义的

基金项目: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中国人民大学985课题。

作者简介: 贾根良(1962-),男,河北蠡县人,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经济思想史、演化与创新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姚开建(1953-),男,北京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经济思想史。

① 这是笔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出版的《经济思想史研究丛书》撰写的“代总序”,发表时有修改。

② 参见[英]爱德华·富布鲁克主编的《经济学的危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最初600天》,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本质都在于视西方主流经济学为唯一科学的经济学，要求将这一范式的学术主张和实践上升为整个学科必须遵奉的学科标准和学术规范，并将其贯彻到经济学学科的教学、科研和人才选拔等各个方面，从而使西方主流经济学从体制上锁定整个学科。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学界应该对“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提出的问题加以深思和考察，而不能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如果在没有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科学基础和危机状况进行深入研究的情况下，没有考虑到中国所需要的经济学类型情况下，固执地按照已经接受的新古典范式继续大规模地推行中国经济学教育体系的“全盘西方主流经济学化”，无疑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我们知道，经济学家们非常信奉以反思或省察为第一要义的理性概念，据说最近又开始了对信念和认知模式的前沿性研究。但是，他们实在应该首先研究一下自己的理性、信念和认知模式，而经济学家们的理性、信念和认知模式基本上是由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或世界观所构成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此加以简要考察。

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曾写过一段著名的话，“正当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开始为现代经济学奠基时，物理学一场惊人的革命扫荡了自然科学和哲学中的机械论教条。奇怪的是，‘效用和自私自利的力学’的建筑师，甚至是晚近的模式设计师，看来都没有及时地觉察到这种没落”。^①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仍坚持以机械还原论为基础的理性——个人主义——均衡世界观，而不敢越雷池一步，这种陈旧的世界观在处理日益复杂的现代经济生活时越来越显示出其严重的和无法克服的缺陷。

上述机械的、静态的和封闭的世界观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把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视为普适的甚至唯一的科学方法，从而建立起由此所支配的单一学术规范。但是，通过对其科学哲学基础加以考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封闭系统的假定还是内部相容性的标准上，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都因为其自身的缺陷而无法保证数学方法的现实相关性。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使经济学日益远离现实，也远离科学，因为科学不能脱离对现实的关注。针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的科学性取决于数学形式化的观点，支持经济学改革运动的法国经济学家们指出，将科学与使用数学联系起来是幼稚的和荒谬的，将关于经济学科学地位的争论局限在使用数学与否这个问题上是一种欺骗。^②

长期以来，虽然包括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对经济学中的数学形式主义都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是，由于数学形式主义在西方经济学界的制度化，它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中不能根除的癌症。霍奇逊在谈到这种状况时非常悲观地指出，形式主义的做法，既不需要经济学史的知识，甚至也不需要了解现实经济的历史。形式主义不断成长并自我强化，就像劣币驱逐良币一样。如果经济学还没有死亡，也是正在死去。经济学不管是在苟延残喘，还是已病入膏肓，在目前普遍流行的经济学系的框架之内，其复原的希望极为渺茫。^③

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非常有趣的两个现象。首先，虽然西方异端经济学各种研究传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其直觉意识却与现代自然科学所提供的新的世界观相契合，它对实在性质的认识也免除了数学形式主义的科学主义思维。然而，西方异端经济学各流派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强烈的门户之见，往往高估自身而贬低别派，甚至也存在对本流派思想传统的教条主义，如后凯恩斯学派代表人物保罗·戴维森就宣称凯恩斯的《通论》一书是对新古典理论唯一真正的替代。其次，社会科学中其他学科对经济问题的浓厚兴趣正得到迅速发展。目前，商学院、社会学系等其他院系或公共政策研究机构的许多学者正在从事以现实为导向、面向公众的经济学研究，其优秀研究成果主要见诸商学院、技术政策、公共政策和国际关系之类的出版物，或者通过出版著作来发表，却鲜见于权威经济学期刊。^④ 这些在经济院系之外所从事的经济问题研究往往不被西方主流经济学认可。

① Georgescu-Roegen, N., *The Entropy Law and the Economic Process*, 1971, pp.2-3.

② [英] 爱德华·富布鲁克主编：《经济学的危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最初600天》，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5页。

③ 霍奇逊：《20世纪的经济学：失去机会的世纪》，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④ 霍奇逊：《20世纪的经济学：失去机会的世纪》，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然而，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之外的经济学研究，特别是演化经济学的研究，实际上大都是社会科学诸领域中广泛涌动的演化科学新范式这种潜在潮流的组成部分。演化的社会科学是社会科学诸学科未来发展的大趋势，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却锁定在传统的经济学范式而不能自拔。因此，中国经济学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旧范式的发展上落后于西方并不是灾难，而是机遇，因为经济学思想史的观察证实了进化生物学的“异地物种形成原理”：新物种的形成和演化要远离原物种数量巨大和竞争激烈的地区，一种新型的经济学最有可能在原有经济学范式还没有锁定的、处于半边缘的外围地区通过“间断平衡”的方式得到更彻底的发展。如何避免重蹈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覆辙，并从西方异端经济学中吸收有用成果又避免其门户之见，同时把西方社会科学界在经济院系之外所从事的大量经济学研究纳入我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体系之中，是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必须深入研究的一个问题。

但是，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并非只来自于对西方社会科学大趋势的观察，更主要的是起源于中国问题的意识。目前，有关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仍相当不发达的，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理应在实现经济起飞的过程中对此作出重要贡献。虽然中国在过去30年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但正如我国目前所遭遇的许多困难所警示的，过去的成功并不能保证将来能够取得同样的成功，而我们目前对过去成功的原因仍缺乏更深入的理解。特别是在面临新技术经济范式革命的挑战下，如何在人口如此众多和生态资源环境压力如此巨大的情况下继续实现迅猛的经济发展，仍是悬而未决的重大经济学课题。对于解决这些问题来说，华盛顿共识的失败标志着西方主流经济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而目前的西方异端经济学也不足以应付这种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学别无他路，只能以中国问题为核心进行独立自主的理论创新，实现服务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

二、经济思想史研究对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的重要意义

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的主要目标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核心，大力发展演化科学的新范式。在这种情况下，尖锐的问题意识是必须时刻牢记在心的。然而，能否针对中国问题提出特殊而具体但却具有重大与原创性的理论命题，并通过演化科学新范式的创造性之发展谋求强有力的解答，则取决于中国学者经由各种途径潜移默化所获得的深邃的支援意识。所谓支援意识就是米切尔·波拉尼所说的从科学传统或文化传统中所传承的“意会性知识”。那么，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需要哪些类型的支援意识呢？首先，作为欠发达国家，由于它面临着与发达经济相当不同的某些重要理论命题，因此，有关从欠发达经济向发达经济的历史性转变的当代与历史经验及其理论概括的支援意识是必不可少的。其次，由于演化新范式在经济学或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中某种程度上还落后于现代自然科学，因此，从哲学和现代自然科学中吸收广泛的营养自然也就成为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的一个基本前提条件。最后，演化科学的新范式不仅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中有其丰富的先驱思想，而且也与中国哲学传统具有某种惊人的类似性，^①因此，如何以一种全新的眼光对来自思想史的支援意识进行创造性转化同样是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的一项基本的理论工作。

按照上述支援意识的思路，经济思想史研究无疑可以为经济学的创新提供重要的灵感来源，特别是在演化科学新范式在经济学中方兴未艾的今天更是如此。科学发展史告诉我们，当一个学科在发生危机并酝酿范式革命的关键时刻，对本学科的历史进行反思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著名物理学家彭加勒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物理学大革命中曾写到，为了预见数学的未来，正确的方法是研究它的历史和现状。同样，不了解经济思想史，我们也就不知从何创新。奥地利学派著名经济学家沙克尔说得好：“创新性的理论家需要无情的自信。他必须推翻成百上千人的认识，他的第一本能就是进行抵制和反攻。但是，理论的重建必然不可避免地使用许多旧的材料。对于以前理论的虔诚不仅是可敬

^① 贾根良：《中国古代演化思想与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南开学报》，2004年第4期。

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不借鉴传统的发明将举步维艰。”^①那么,对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而言,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具有哪些重要意义呢?

首先,它有助于培养经济学多元主义思维,摧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统治地位。经济学多元主义是“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核心纲领之一,它倡导在经济学内部形成多元主义的智力格局,实现不同的方法、理论和范式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竞争,反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垄断地位。所谓经济学多元主义,用尤斯凯利·梅基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世界与多个理论”^②;虽然客观世界是唯一的,但它却是由无数个事物、复杂的演化过程以及不确定的未来所构成,因此,由于观察者的角度不同,世界就会呈现出千姿百态,观察者对它的解释也就呈现出多样性、可错性和不完备性。按照经济学多元主义的这种观点,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过于简单和静态的研究范式存在严重缺陷,但它仍不失为研究现实世界的一种方法,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并不否认它的价值,而是要致力于发展更为复杂的和动态的演化科学新范式。

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可以为这种多元主义思维提供宽广的视野。经济思想发展史中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经济学内部一直就存在着不同的研究传统,即使在同一种研究传统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范式;而且,主流与非主流的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某国或某个历史时期的异端学说在另一个国家或另一个历史时期很可能就成了主流学说。例如,当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更多地支配着英国经济学发展的同时,德国历史学派在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以及美国老制度学派在20世纪初曾经分别是德国和美国的主流经济学,而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在美欧国家的确立也只是在战后才发生的事情,但它仍一直遭到众多西方异端经济学流派的反对。

由于无视经济思想史的上述基本事实,我国经济学界曾一度流行过“只有一个经济学”的教条主义观点。按照这种观点,经济学原理是一元的和统一的,经济学是不应该有国别差异的,即世界上只有一个真正的经济学,这就是以所谓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甚至有位著名经济学家认为,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依据都是相同的,都是基于现在的主流经济学,而经济学最基础的理论还是一般均衡理论,即德布鲁的均衡理论,它的基础非常坚实,现在发展不出另外一套逻辑来替代它,只能是在这一套逻辑的基础上加以补充、修正和发展。^③这些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也取消了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的必要性。因此,针对中国经济学界目前的状况,经济思想史研究不得不承担起解放思想的基础性功能。

其次,正如古木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所指出的,“自然科学发展出了一些具有进化论意义的复杂系统,它们所提供的概念框架为社会科学展现了一整套连贯的思想,而这套思想与社会科学领域里的某些由来已久的观点是非常吻合的”。^④笔者认为,西方经济思想史中的演化思想在西方社会科学史中是最丰富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可以为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演化科学新范式的发展作出三种最基本的贡献:为其提供必备的建筑材料;为其理论创新的成败提供历史上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为其目前发展中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或被忽视的重要理论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灵感来源,使其建立在坚实的思想史基础之上。

虽然演化经济学的先驱思想可以远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和经济学,并包括历史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等,现代演化经济学的诞生却是达尔文革命的产物。凡勃伦深受达尔文革命的影响,在1898的经典论文《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演化科学?》中不仅创造了“演化经济学”这个术语,也提出了一种试图把经济学转变为一种演化社会科学的雄心勃勃的研究纲领。在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① 转引自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定性问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91页。

② 尤斯凯利·梅基:《一个世界与多种理论》,载杰弗里·M·霍奇逊主编《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关键性概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③ 贾根良:《中国经济学革命论》,《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

④ 华勒斯坦等:《开放的社会科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68页。

之前,演化思想在经济学界是非常流行的,以至于马歇尔宣称:“经济学家的麦加在于经济生物学而非经济力学。”^①但是,由于演化主义在20世纪初到40年代堕入了发展的“黑暗时代”,受其影响,经济学中的演化范式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已不再受欢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古典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越来越获得支配地位,经济学的演化范式更是陷入沉寂状态。到了20世纪80年代,演化经济学才开始复兴。目前,演化概念已经成为经济学中一个非常流行的术语,以至于演化博弈论和复杂系统经济理论都声称属于经济学的演化范式。

然而,按照开放系统的现代宇宙观和社会科学的特定性质,演化博弈论和复杂系统经济理论并不能归入演化经济学,它们与西方经济思想史中演化科学新范式的早期尝试及其先驱思想也是格格不入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研究西方经济思想史是洞悉演化经济学未来发展方向的基本途径。例如,由于凡勃伦为社会经济体系的演化提供了一个最早、也最深奥的达尔文式的解释,因此,霍奇逊指出,为了重构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同时也是为了避免科学上的重复发现,我们在时间上将不得不作出大跨度的回溯,重访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演化争论,重访皮尔斯、詹姆斯、凡勃伦和康芒斯的智力世界,将发现,我们想要说的大部分从前已经被谈过了。^②

由于西方经济思想史存在着大量的和丰富的演化思想,因此,对于演化科学新范式的未来发展来说,回访西方经济思想史就成为一项基础性的理论工作。以霍奇逊最近出版的两部经济思想史著作(2001年的《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定性问题》和2004年的《制度经济学的演化:美国制度主义中的能动性、结构和达尔文主义》)为例,我们可以总结这种工作对演化科学新范式的发展所具有的以下三种基本的建设性作用。

第一,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目的是要从过去重新获得建设某些新东西的材料。例如,有关能动性和结构的关系问题目前在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仍是一个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问题。而霍奇逊认为,这其中某些未解决问题的答案看来主要蕴涵在美国(基本上是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一些文献中,对这些文献进行重新探讨能够获得宝贵的智力启迪和指导作用,这可能就是霍奇逊为什么要对美国制度主义中的能动性、结构和达尔文主义进行研究的动机。

第二,经济思想史研究可以为演化范式的新发展少走弯路提供难得的经验和教训。例如,霍奇逊通过对美国制度主义思想史进行研究,揭示了美国老制度学派在后期发展中为什么会偏离并失去在其开端所具有的达尔文式视野,这种教训在今天仍值得我们深思和吸收。

第三,经济思想史研究可以发现演化科学新范式目前的发展中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或被忽视的重要理论问题。例如,情境与脉络特定的理论和方法(历史特定性问题)只是在过去的几年中才开始被重视,而这个问题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被卡尔·马克思和其他德国历史学派的学者所认识,并一度在以后近百年时间里成为经济理论的中心问题,霍奇逊2001年的著作无疑将推动演化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这个重要的理论问题给予更多的注意并从其思想史研究中汲取许多教益。

经济思想史研究对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的最后一个但也是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探求目前发达国家在历史上处于穷国地位时,它们采取了哪些政策工具、制度措施和“发展战略”来达到致富目标的?作为这些政策工具、制度措施和“发展战略”之基础的经济学说是如何进行论述的?在信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它们是否仍然有效?通过这种研究,经济思想史可以直接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借鉴。在这方面,英国剑桥大学发展经济学家张夏准和挪威经济学家赖纳特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对发达国家在历史上是如何发展起来的研究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和“华盛顿共识”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为发展中国家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新思路。

①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8页。

② 霍奇逊:《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载杰弗里·M·霍奇逊主编《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关键性概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特别是以赖纳特为代表的经济学家通过对西方经济思想史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经济思想史中就存在着一种通过重商主义、美国学派、德国历史学派、马克思经济学、美国制度主义和熊彼特经济学等一直延续到现代的“以知识和生产为基础的替代性教规经济学”,^①这是一种把生产、知识、创新、协同、报酬递增和由此所引致的制度变迁看做是经济发展核心机制的经济学,英国、德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等之所以相继崛起,就是因为当它们处于穷国地位时就接受了这种“替代性教规经济学”的基本法则。现在,它仍可以为我国建设创新性国家提供重要的理论和历史经验借鉴,为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提供重要的思想来源,从而构成我们所谓“新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新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设想

既然经济思想史研究对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按照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的两个主要目标,我们对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就面临着两项新的工作。

第一项工作就是根据现代宇宙观从哲学基础上重新思考西方经济思想史的体系结构及其演进,对经济演化思想史进行整理并作出新的阐述。这只有在哲学基础上深刻地领悟现代宇宙观的精髓及其在演化社会科学新范式上的具体体现,才能够胜任这项工作。一般说来,与牛顿主义的时间可逆、本质论思维 (Typological Thinking)、静态的、原子论的、封闭的和机械决定论的世界观形成鲜明对照,现代宇宙观则是以达尔文主义的时间不可逆、个体群思维 (Population Thinking)、动态的、有机的、开放的和不确定性的世界观为特征。但是,目前的经济学教育根本无法满足这种“新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需要,因此,“新经济思想史”本身就必须造就一批在哲学基础上特别是在社会科学哲学的最新进展上训练有素的经济学者。

但是,经济思想史本身在与现代宇宙观之间的关系上绝非处于被动地位,研读经济思想史对于理解现代宇宙观在演化社会科学新范式上的具体体现具有能动性的启发和推动作用。其原因就在于,正如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普里高津曾一针见血指出的,经典(自然)科学不承认演化和自然的多样性;现代宇宙观是在19世纪下半叶的生物学革命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物理学大革命中诞生的,20世纪下半叶自然科学中的复杂性科学革命进一步丰富了这种新的宇宙观。但是,如果具备了现代宇宙观的一些基本知识,我们就会发现,现代演化经济学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中的诸多先驱在其直觉意识上与现代自然科学所提供的宇宙观具有一致性,其理论工作具有朴素的现代宇宙观的要素,甚至我们可以说,它们具有现代宇宙观的某些先驱思想。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当我们按照演化科学的新范式重新确定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时,就必须重写经济思想史。例如,随着自然科学中的复杂性科学革命被一些经济学家所接受,他们就带着一种新的视野重新审视了经济思想史,1998年美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对经济思想史中的复杂性理论的专门讨论及其出版的著作^②就是这方面的例证。根据这些学者的研究,按照复杂性理论的透镜来透视,经济思想史中原先地位很高的一些经济学家如李嘉图的地位就大大下降了,而那些受到轻视甚至不被认为是经济学家的学者如巴贝奇等就迅速地地从默默无闻上升到显赫的地位。该书主编科兰德还指出,在经济思想史中,有关复杂性的观点最有趣的故事与异端经济学家们有关,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具有某种接近复杂观的思想。实际上,科兰德在这里所说的异端经济学基本上都是我们所说的演化经济学的先驱,但相对于西方经济思想史中丰富的演化思想而言,按照复杂性理论对经济思想史进行观察至多只能得到非常局部的认识。

然而,如果按照现代宇宙观重新观察西方经济思想史,我们就会发现,自文艺复兴以来,在西方

^① 参见赖纳特、贾根良主编《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② David Colander (ed.), *Complexity and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Routledge, 2000.

经济思想史中就形成了两种相当不同的经济学研究传统：一种是从重商主义、美国学派、德国历史学派和熊彼特经济学甚至马克思经济学等一直到现代演化经济学的研究传统，而另一种则是从重农主义、大卫·李嘉图、“庸俗经济学”和边际革命等一直到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传统，这是分别以两种不同的宇宙观所形成的两大经济学研究传统：前者以动态的、系统的和有机的宇宙观作为其哲学基础，而后者则是以静态的、原子论的和机械的宇宙观作为其哲学基础。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眼中，前一种传统被看做是异端并遭到贬斥，而后一种则被视为正统而得到推崇。

但是，如果从“新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视角出发，我们就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看法：被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看做是异端的经济学研究传统才代表着经济学的未来。因此，“新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按照这种革命性的思想重新梳理经济思想史，为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提供思想来源。例如，在一些非常重要的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马克思和马歇尔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经济学的这两大研究传统同时并存，但现有的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严重地忽视甚至完全没有讨论这些经济学家的经济演化思想，所以，按照经济学的两大研究传统重新思考并进一步阐释这些经济学家的理论体系，我们就能够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取得重要的创新性研究成果。

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给它提出的第二项研究工作是什么呢？我们已经指出，对于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来说，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可以为解决中国问题并提出特殊而具体的理论命题提供支援意识。因此，“新经济思想史”提出的第二项工作就是要以中国问题意识为核心，对目前发达国家在历史上如何成功地解决从欠发达经济向发达经济的历史性转变的相关经济思想史进行研究，对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如何成功地解决类似于我国目前所面临挑战的相关经济思想史进行研究，结合信息通信技术革命、中国国情和目前我国所处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对历史上的这些经济思想目前在多大程度上仍是有效的进行研究；研究这些经济思想是否需要扬弃或者根据新的条件加以修正和发展。通过这些研究，经济思想史学科可以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重要的支援意识。

为了达到这种目标，经济思想史研究所包括的范围就必须扩大，除了对比较系统的经济学说史或经济思想史进行研究外，还必须结合经济史和“经济政策史”，对“经济政策思想史”进行研究。虽然经济史和“经济政策史”并不属于思想史的范围，但人们并没有理由把以其为基础的“经济政策思想史”排除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范围之外。然而，目前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偏重于已成系统的经济学说史，重点放在了以特定的假定为基础的抽象的经济理论上，轻视那些以现实观察和历史经验为基础的抽象程度较低的、有时可能不被视作经济理论的经济思想，尤其是忽视那些对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曾经产生了重要的实际影响但却不系统甚至还有待于我们加以总结的经济思想。但是，当落后国家在对发达国家进行追赶的过程中遇到非常棘手的重大问题，并试图从发达国家处于类似发展阶段时的解决办法中寻求借鉴时，特别需要的却是目前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所忽视或根本就不存在的后两类研究。正是因为这种原因，以现实观察和历史经验为基础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思想史”就构成了“新经济思想史”的重要内容。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在这里仅以卡尔·波兰尼的《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①（1944）为例，来说明以现实观察和历史经验为基础的经济理论的重要性。卡尔·波兰尼的这本著作以西欧经济为主分析了从18世纪市场受到严重管制的社会经济状态如何转变为19世纪“没有控制的”市场经济，然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又如何再转变为对市场经济进行限制和实施国家干预的过程，并把后一种转变命名为“大转变”。卡尔·波兰尼以19世纪到20世纪40年代的西方经济史为基础，提出这样一种理论：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十足的乌托邦，它自身具有一种毁灭人类并把人类的环境变为一片荒野的倾向，因此，社会必然要采取措施保护自己。从自我调节市场体系诞生之日起，社会保护就必然成为其伴随物。“19世纪的社会史，是一个双重运动的结果”：一方面，市场在全球到处延

^① 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

伸扩张,所涉及的商品之数量增长到了不可思议的规模,但另一方面,却出现了一个旨在对抗市场经济有害作用的深层次运动。卡尔·波兰尼指出,社会保护自身以躲避自我调节市场体系所固有的危险是这一时代历史中最具包容性的特征。

但是,尽管自由市场和社会保护是相伴而生的,然而,这两种力量的此消彼长却呈现为一种周期性的长期运动:如果自由放任运动无视它所导致的两极分化、失业和社会动荡不安的状态,最终必然要引发旨在抵制其严重危害的反向性社会保护运动。特别是当一个国家在自由市场经济上走得越远的时候,社会对其反冲力就会越强大。但是,正如卡尔·波兰尼所指出的,社会所采取的任何措施都会损害市场的自我调节、破坏工业生活的组织并因此以另一种方式来危害社会。卡尔·波兰尼的言外之意就是,自由市场与社会保护这种长期的“双重运动”并非一直能够保持钟摆式的平衡,有的时候甚至能够酿成重大的社会灾难。例如,作为对19世纪末自由放任运动的反应,反向性社会保护运动的不同强度产生了福利国家、苏联社会主义、德国法西斯主义以及东亚发展型国家四种不同的社会类型,其中法西斯主义对人类社会造成了空前的灾难。

卡尔·波兰尼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中“名不见经传”,但他的上述理论(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社会经济史理论)不仅为我们理解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的各种经济学说提供了一把锋利的解剖刀,而且对认识当代中国所面临的严重社会经济问题也提供了深邃的洞察力。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目前正处于卡尔·波兰尼式“双重运动”中强调社会保护更为严峻的转折点上。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长达十多年内需仍难以启动、医疗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失败、市场道德败坏行为(如毒奶粉等一系列事件)、“三农问题”、资源环境和生态的破坏以及中国经济相当大面积已经被外资控制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在昭示着我国今后的改革开放需要一种“大转变”。

与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变”相一致,如果把我国改革开放置于经济思想史中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国家干预)的周期性交替这种国际大背景之下,我们同样可以观察到,新自由主义自20世纪70年代兴起以来,其发展势头在步入新世纪之时已经出现衰减的迹象,自那时开始,周期性交替的钟摆在发展中国家开始了摆向国家干预和保护民族工业的方向。^①目前,经济全球化过程已经出现停顿,而多哈回合的流产和美国经济危机的爆发则是经济全球化过程有可能发生逆转的重要信号。通过社会保护、民族产业保护和生态环境保护等一系列制度建设和改革措施,遏止市场经济的毁灭性影响,使中国经济改革重新回到独立自主和共同富裕的健康道路上是我们目前大转变的核心主题。但是,我国主流媒体却仍在宣传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代言人所谓“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能动摇”等陈词滥调,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经济思想史的知识、特别是不了解经济思想史中以现实观察和历史经验为基础的经济理论的结果。

我们认为,“新经济思想史”研究在中国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是中国经济学界可以为之努力的一项事业。目前,国外经济思想史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新思想和新材料,并开始颠覆经济思想史学界有关重商主义、重农主义、亚当·斯密、德国历史学派和新古典经济学统治地位等许多方面的传统观点和理论,但这些新思想和新材料却仍然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排除在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之外。在这种情况下,目前的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维护西方主流经济学统治地位的工具。因此,以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以及批判实在论社会科学哲学的新发展为指导,以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为核心,按照经济学的两大研究传统重新梳理和重写经济思想史,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项前沿性课题,它不仅大力促进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许多重大实际问题作出积极的贡献。

责任编辑:李华

^① 贾根良、黄阳华:《评发展中国家贸易保护还是自由贸易的新争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年第5期。